



## 砂眼里的春天

□ 卢有林

去年冬天,一只用了好多年的大号钢精锅底部渗漏了,完成了烹煮人间烟火的使命,被我丢在院落一角。妻子灵机一动,在锅里填上泥土,栽上葱果。今年初春一场雨后,我在打扫庭院的时候,发现小葱卯着劲儿往上冒,绿得扎眼,给这口旧锅增添了几分生气。倒也不奇怪,毕竟我精心照料着它们,给它们浇水、施肥、除草,如今也该是它们回报我的时候了。

忽然,我的眼前一亮,瞥见一簇嫩绿竟从锅壁的砂眼里钻了出来。走近一看,它的茎细得像一根绿绒丝线,却倔强地向上挺着。那是一株不知名的野草,柔茎泛着新绿,圆叶透着娇嫩,在料峭的春风里轻轻晃着,像个怯生生的孩子,踮着脚向春天问好。它的根藏在锅壁后的泥土里,我虽看不见,却能想象那是一段何其艰辛的历程:从一粒种子长成小草,从铜墙铁壁般的禁锢中突围,从无边的黑暗走向明媚的春光。

于是,我陷入了遐思。

当它还是一粒种子的时候,它被笼罩在黑暗的世界里,被厚重的泥土挤压着,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四周是潮湿的阴冷,是无尽的沉寂。可它从未放弃对光明的向往,那点初心像埋在心底的火种,在黑暗里静静酝酿。它吸饱泥土中的水汽,让外壳慢慢膨胀、开裂、生根、发芽。那稚嫩的芽尖,像一只试探的手,在黑暗里摸索着突围的方向。根须一点点深扎,茎芽缓缓延伸,如同深夜赶路的人,凭着对光明的执念,在黑暗中摸索、探寻,一步步走向黎明。

当它的根茎初成时,新的枷锁又在禁锢着它。锅身是冰冷的金属,把它囚困在方寸之间。它不能像太阳底下的野草那样自由生长,恣意延展,更不能像花盆里的花卉那样被人精心照料,只能在这近乎窒息的空间里苦苦挣扎。努力向上,却被厚土压制;奋力旁伸,又撞在坚硬的锅壁上。可它从

未屈服,每一次碰壁后,都重新调整方向,去寻找那一线可能的生机。也许是某个雨后的清晨,它的尖梢忽然触到一丝微凉的空隙——那是锅壁被岁月磨出的砂眼,小得如同针孔,却是它唯一的生路,犹如困于孤岛的人,望见了一叶孤帆。

从砂眼里往外钻的日子无异于一场炼狱。冰冷的金属边缘刚蹭着它柔嫩的茎,每向前一寸,就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它告诉自己不能退缩,因为身后是无尽的黑暗与禁锢,前方才是它朝思暮想的光明。终于有一天,它的尖梢钻出了砂眼,它第一次看见太阳,第一次沐浴到了和煦的春风。它没有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放弃生长,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停止挣扎,它在黑暗里坚守初心,在禁锢中寻求突破,在砂眼的刚蹭里咬牙坚持,最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如今,那株野草依旧在钢精锅的砂眼旁生长着,嫩绿的叶片依旧在春风里摇曳。每当我看到那抹嫩绿,心中便会充满力量,因为我知道,无论生活给予我们多少磨难,只要我们像那株野草一样,心怀希望,不改初心,就一定能在命运的砂眼里,钻出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我们高邮,“老爷”不是官,是对最小叔叔的称呼。我这个“老爷”,比大侄安来还小一岁。我们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如今他住在城里,我守在乡下老家,可每次见面,他头一句话依旧是那声洪亮的“老爷”。我应得顺口,就像屋后那条小河,流了六十年,还是老方向。

打从记事起,安来就没喊过我名字。他妈问他跟谁打架,他抹着鼻涕说“跟老爷打的”;他爸问他葡萄谁摘的,他梗着脖子说“老爷让我摘的”。明明比我高半个头,力气也比我大一圈,可这声“老爷”从他嘴里出来,就跟村头老槐树上的鸟叫一样自然。记忆最深的,是那年夏天,葡萄熟得发紫。

我家有两棵大葡萄树,是我父亲托人从外地带回的苗,就栽在安来家猪圈旁边。那地方向阳,东南风呼呼地吹,没几年,葡萄藤就爬满了旁边两棵楝树,藤条粗得跟小孩胳膊似的。每到七八月,一串串紫红的葡萄垂下来,馋得全村孩子直流口水。

可麻烦也来了——树身只容一个人爬上去。

为这事,我们叔侄俩没少闹仗。那天下午,知了叫得人心烦,我挎着竹篮往树下走,安来早就在那儿等着了。

“我先上!”我蹦着高去够树干。

“凭啥?”他一把拽住我裤腰带,“树长在我家猪圈旁,该我上。”

“葡萄是我父亲栽的!”我急得直跺脚。

“葡萄长在我家树上,就得听我的!”他个子高,胳膊一伸就把我挡在外头。

我们俩像两只打架的公鸡,你推我搡,从树下吵到墙角,又从墙角骂回树下。太阳晒得头皮发烫,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我憋足劲儿往树上冲,他一把揪住我后脖颈子;我回身要拽他腿,他灵巧躲开,反手把我按在猪圈墙上。到底他大一岁,力气跟头小牛犊似的。我挣得满脸通红,胳膊都酸了,他终于瞅准空子,蹭蹭几下爬上树杈。等我喘过气来,他已经坐在高处,摘了最大一串葡萄,一颗一颗往嘴里送,紫红的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流。

“安来,给我吃点。”我仰着头,脖子都酸了。

他晃着腿,故意嚼得吧唧响:“不给!谁让你刚才拽我?”

“就一颗!”

“一颗也不给。”

我气得浑身冒火,眼睛在四周乱转,忽然瞅见墙角的水桶,心里冒出个馊主意。我悄悄拎起桶,猫着腰绕到河边,舀了半桶河泥,又蹑手蹑脚回到树下。

安来还在树上吃得得意,压根没留意我在底下忙活。我把桶往地上一放,双手抓起黑乎乎的河泥,照着树干一层层糊上去。稀泥顺着树皮往下淌,干一层再糊一层,等桶里的泥糊完,树干从上到下像穿了件黑棉袄,滑溜溜的。

“你干啥呢?”安来终于探下头。

我又着腰站在太阳地里,脸上身上溅满泥点:“让你下不来!”

“我偏下来!”

他试着往下出溜,脚一踩到糊泥的地方,“刺溜”一下直打滑。再试,再滑。最后他只能抱着树杈,气鼓鼓地瞪着我。我蹲在树荫下,仰着脸冲他笑,笑得没有站在风里等我们的两个老人了。

## 叔侄情深

□ 卢世平

太阳一点点西斜,树荫越来越长。安来在树上换了七八个姿势,从坐变成躺,又从躺变成趴。我的腿也蹲麻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拿根草棍逗蚂蚁。

“老爷——”树上传来闷闷的声音,“你让我下去呗。”

“不让你下。”

“我错了还不行?”

“哪儿错了?”

他半天没吭声,最后憋出一句:“不该不给你吃葡萄。”

我仰起头,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那点气早跑光了,可嘴上还硬:“那你扔串葡萄下来。”

他真的摘了一串扔下来,差点砸到我头上。我捡起来,揪一颗塞进嘴里,真甜,甜得牙根都软了。

这时候大哥从村卫生室下班回来,见安来不在家,一路寻到葡萄树下,抬头一看,安来像只壁虎似的趴在树杈上。再看看糊满泥的树干,大哥又气又乐:“你们两个小祖宗,这是干啥呢?”

后来还是大哥挑来清水,一瓢一瓢把泥冲掉,安来才下了树。那天晚上,我们俩被按在院子里,一人屁股上挨了两鞋底。可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我们又是一块儿去河边摸鱼了。

到了上学年纪,我妈让我跟着安来去学校。

村小学设在祠堂里,没有幼儿园,先上一年识字班,再上一年级。安来已经上一年级了,我妈牵着我的手,安来跟在后面,一起去找冯校长。冯校长推推眼镜,和和气气地说:“这孩子小,先上识字班吧。”

我说我要跟安来在一起。

冯校长说不行。我就哭了,眼泪像决了堤,哭得惊天动地。班主任卢老师过来拉我,我挣开她的手,一头扎进一年级教室,死死抱住安来坐的课桌腿。谁来拉我,我就嚎,嚎得整间教室都安静了,几十个孩子瞪着眼看我。

安来坐在条凳上,先是一愣,后来悄悄把屁股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巴掌大一块地方。我抹着眼泪一屁股坐上去,双手还抱着桌腿不肯松开。

冯校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行了行了,就坐这儿吧。一年级就一年级,跟不上可别哭。”

我跟安来对视一眼,他在桌子底下悄悄捏了我的手。

那之后好几年,我们一直同坐一张课桌。他算术比我好,我语文比他强。他铅笔秃了,我把自己的悄悄推过去;我挨了老师批,他在桌底下轻轻踢我的脚。放学路上,我们一块儿掏鸟窝、摘桑葚,有时也打架,打完了,他还叫我“老爷”,我还叫他安来。

后来,他考取了卫校,我当了兵,见面越来越少。有一年他放假回来,兴冲冲跑到我家,从书包里掏出一包点心塞到我手里:“老爷,给你带的。”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他还是那个趴在树上喊我“老爷”的皮小子。

六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叫我“老爷”,我还是叫他安来。有时候他回来,我们坐在老榆树下抽烟,谁也不说话。烟灰落在地上,风一吹就散了。可那声“老爷”,风吹不散。

## 院里的银杏又发芽了

□ 陆敏

收好多白果。爷爷勤俭了一辈子,不舍得浪费一颗果实,一到收获的季节,总能看见他在庭院里忙个不停。银杏果需要用石灰水浸泡,把表面的果皮烂才会露出圆滚滚的白果来。这个过程他是不会让小辈来碰的。洗干净白果晒得壳子发白,分装在几个布袋子里,等着儿女们回来拿。他总说,“这东西润肺,煲汤熬粥放两颗,比买的补品实在。芯子苦,要记得抠出来。”

随着先生转业安置在县城高邮,我成了孙辈中离爷爷最近的。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外租房,出行也靠公共交通,上城下乡总是诸多不便,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回去。2023年,我们住进了新房,买了车,回老家的次数开始变多。记得第一次开车回乡下,前一天晚上就给爷爷打了电话,让他别烧饭,等我回去做。第二天一早,爷爷就站在河边的大圩上翘首以盼。我们一下车,儿子便大声地喊:“太爷!太爷,我回来啦!”爷爷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大手牵着小手,直往院里去,那里是爷爷的零食库,只要儿子喜欢的,爷爷一股脑儿往他口袋里塞。儿子最期待的就是回老家看太爷,在那里他可

以享受太爷所有的爱,边看电视边吃零食。老家成了我们周末去得最多的地方,乡下的泥土,门口菜地里的昆虫,墙根下的蚂蚁,成了儿子最好的玩伴。土灶铁锅炕出来的锅巴,炖出来的鸡汤,也成了我最爱的食物。

有时候我们忙,爷爷就坐公交车到高邮来。逛商场时,儿子总像个大小人一样,牵着爷爷的手,做爷爷的拐杖。“太爷,你累不累?我给你找凳子坐。”“太爷,这个好吃呢,你尝一尝。”……每次都把爷爷逗得不拢嘴。

去年八月,爷爷做了手术,从高邮到上海,又从上海回到高邮,昔日硬朗矍铄的老人一下子就倒下了。九月底,爷爷回到老家,姑妈为了照顾他也一起回来了。老家的银杏树依然枝繁叶茂,只是树下忙碌的身影变成了姑妈。依然是那张老躺椅,这时的爷爷只能躺着看季节变换,看时光流逝,看银杏树叶从绿到黄,看银杏果一颗颗往地上掉,落满地面。

姑妈一个人照顾爷爷十分辛苦。我与先生商定隔一周回去一次,想着能多陪陪爷爷。日子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啊!我们陪着爷爷走过秋分,跨过冬至,却没盼来立春。

院子里的银杏树枝头星星点点冒出嫩芽,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不久将又是郁郁葱葱的景象。想必今年的果实也不会少吧。

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是我有记忆起,它就一直存在。是心疼远嫁的女儿,还是老一辈藏不住的偏爱?

高一下学期,妈妈在外租了个小房子,既能节约我和姐姐两个人的住宿费,也方便打零工照顾我们。有天上课,门卫突然来教室告知老师,说校门口有人找我。我来到校门口一看,居然是外公。他佝偻着腰,眼中泛着泪花,手里拎着一大块肉,还有一袋金刚脐。此时的外公因病时而清醒时而糊涂,那天是趁舅舅们不注意溜出来的。除坐车费外,他用仅剩的钱买了肉和金刚脐,要给他外孙补补身体。

大学毕业我入了伍,当兵第二年考军校。走出考场回营区的那天,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妈妈,此时才知道外公外婆已在这一年先后离去。他们清醒的时候特意交代家里人:“不要告诉二子(我的小名),让他安心考试。”收到正式通知的那天,我正随连队在太行山深处训练,望着连绵的群山,站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如今,去往外婆家的泥土路早就修成平整的水泥路,过年再去时,开车都不用十分钟。只是庄台东头,再也没有站在风里等我们的两个老人了。

## 外婆家

□ 柏涛

一般一年只来一次。十几口人,一锅米饭,一锅青菜豆腐汤,两大碗葱油烧肉,顿顿如此,顿顿吃得精光。到了晚上,地上先铺一层塑料布,再铺上厚厚一层稻草,最后铺上垫被,睡了一排,丝毫没有觉得冷。

外婆生了五个子女,妈妈排第二。我们这辈共有七个姨表姊妹,五男两女,我排第四。每年发压岁钱,从一块、两块,涨到五块、十块,每个人都一样。可在无人看到的角落里,外婆总会偷偷往我口袋里塞钱——大家拿一两块的时候她塞给我十块,大家拿五块十块的时候她塞给我二十块,总压低声音说:“放好了,别被他们看到。”我总是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一样。二舅舅成家后,压岁钱由两个舅舅给了,而我那份独有的“小秘密”,从来没断过。初五过后,大家纷纷辞行,外婆总嘱咐舅舅,把自家腌的咸肉,挑两块最瘦的塞给妈妈。这份特殊,不知道

小时候去外婆家拜年,从周山王庄桥下车,到花枝村的外婆家,大约要走3.5公里。在那还是泥土路的年代,即使是晴天,对于五六岁的孩童来说都是头疼腿累的事。好像那时雨雪天气特别多,气温还低,冻硬的路面被太阳一晒,表层化得稀烂。走在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没走多久,鞋子沉甸甸的像两艘小船。一不小心,脚往前走了,鞋子却留在了泥坑里,跟不上步伐。

外婆家所在的庄子,后面是田,前面是河,只有一排庄台。许是计算着时间,在我和姐姐满身大汗、一高一低行到田埂那头时,外婆外公的身影就出现在了视线内。刚到庄台东头,外婆外公粗糙的大手立刻就攥住我和姐姐冻得通红又热得冒汗的小手往家走,爸爸妈妈拎着拜年礼跟在后面。还没进家门,姨娘舅舅家的孩子们闹哄哄的声音就飘了出来,路上的那点疲惫与不快都在见着玩伴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姨家在张轩白马村,小姨家在本镇龙华村,都来得早,有时初一下午就到了。而且,平时他们也常回去。我们家离得远,舍不得那点公交车费,